

廣元千佛崖菩提瑞像考

羅世平

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在隋唐迄宋的數百年間，由於蜀中吐蕃印度道的開通，佛教藝術得以形成高潮。王玄策奉使印度，玄照兩度天竺，唐僧二十許人西天求法，皆經蜀中而達印度。這條道上，京華冠蓋，絡繹不絕；佛教僧衆遊踪相繼。寺廟石窟像飾莊嚴，佛像圖本樣式與中原同軌。在現存數以千計的石窟遺跡中，具有典範意義的佛像樣式尚有完好地保存，其情形正如蘇東坡所說：「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型。」（《東坡七集》）開造於嘉陵江畔、金牛古道上的廣元千佛崖菩提瑞像，即是這類典型像設的遺例。

菩提瑞像窟地處廣元千佛崖柏堂寺上方，屬四川石窟造像中規模較大，雕鏤精美的大型洞窟之一。窟形爲方形平頂式，內造中心壇，壇上雕像一鋪。主尊結跏趺坐於雙層金剛座上，偏袒右肩，手作降魔印，頭戴寶冠，項飾七寶瓔珞，臂腕佩釧，旁脇侍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壇前刻二供養像，作胡跪狀。背屏鏤空雕出菩提雙樹，撐向窟頂，枝葉交蓋於佛上方，形似幡蓋，枝幹間對稱刻出飛天及雷、風、雨神。佛頭項光周圍分格浮雕坐佛十一身，佛後倚靠兩端刻出飛禽及異獸，窟內餘三壁雕十大弟子及鼓樂一班（圖一）。在窟北壁近門處刻造像碑一通，碑頭浮雕龕雙身，額篆「菩提像頌」四字，下行碑文「大唐利州刺史畢公柏堂寺菩提瑞像頌并序」，碑文近門處字跡風化漫漶，不可釋讀。又因王蜀乾德六年（九二四年）越國夫人裝修該窟，在該碑上補刻裝修記，鏤去原碑文字，碑文腰斷，記錄柏堂寺菩提瑞像窟年代及主尊像屬的重要文字均已不存【註一】。原碑額題「菩提瑞像」爲利州畢公造像原名，越國夫人補刻的裝修記將主尊名號稱作密教佛主「毗盧遮那」【註二】，從造像樣式上看，菩提瑞像窟壇像主尊與現存洛陽龍門石窟習稱的大日如來造像樣式十分相似，因此，探討菩提瑞像與毗盧遮那佛在圖像學上的關係就成了本文的主要論題。

一、利州畢公及菩提瑞像的年代

菩提瑞像殘碑，自清代起就引起金石家們的注意。清人劉喜海《金石苑》首次抄錄《菩提瑞像頌》所能辨識的文字二十一行，與現能釋讀的文字大略相同，跋文中對畢公及其瑞像年代均未作出判斷【註三】。繼《金石苑》之後，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亦錄此頌，並參校《元和姓纂》於後跋中證利州畢公為太原畢誠之後畢重華。經判讀文字不避玄宗名諱，視「此碑之刻，不在明皇之前，即在敬宗之世」，為慎重起見，陸氏將碑附於寶歷末。【註四】近人岑仲勉作《貞石證史》，有《畢利州及其時代》一篇，文中除贊同陸氏「畢重華說」外，更校畢公曾祖、大父官職情形，定刻碑年代於開元末【註五】。二者分歧起自碑文的判讀，茲將《菩提瑞像頌》原文輯出，以為訂正年代的依據：

1. 大唐利州刺史畢公柏堂寺菩提瑞像頌并序姪前鄉貢進士彥……男穎
2. 嘗聞瑤界有無生大僊善權多方藏用滅息首出衆聖量涵虛空示色法而……有化偃三空
3. 而不無窮微極思人徑罕及應求而往莫或階焉自白日賜暉雙林稅駕優……以召異或因
4. 機以變石或留影以制龍金蟻神其源白兔祥其末與夫異門同入於樂地……化由乎覺忍
5. 誠信資乎勝根理實然也利州柏堂寺往居列城州牧攸宅 天后聖帝……於茲宇晉壽遺
6. 黎葭萌古壤錦嶂緣其後淩江達其衝軒檻豐麗場域閑敞危途緬衍馳驚……因寺以興號
7. 假樹以立名初者天竺不（衆）生思觀象法能彈衆巧所擬罕成上界通士感念……泥不滿備珍
8. 飾而相好周圍靈哉真顏今即遺制粵若季父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利州……源受魏迄梁之
9. 大業克濟厥美不隕其名管樞極而三事代傳牧本州而五葉相襲英氣聯……郡太守度支尚
- 10 書亮州刺史府君台庭坐謀遺愛貴州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公之 曾祖……大父
- 11 皇朝尚舍奉御蜀號二王府長史台鄂滁三州刺史府君六尚欽若王藩列……器司戎半刺
- 12 邦政馴致威騰景標舉歲蕤昭赫恭列務以夷亂牧外臺而保寧徽問溢乎……絜白安可而

13 縉磷沖用以博暢經才以優洽強學垂裕虛容保和孝睦叶於靈心能事探……倉參軍次拜

14 滁州錄事參軍次除博州錄事參軍遷鄭州司兵參軍初掌軍儲再司樞紐……衝要曳墨綬

15 而効績克揚奉遊冠而清閼頤□□□□門□□□時談 制授秦州都督……奏課連最授

16 金帛以延 渥□品□□以□□□□功俾我今職至夫□禮以訓……肯至于臧否

17 順□何□□儀慧□□□□□□於□□□□□□未□瞻□巖而……獻欵以遐矚

(18 行以下文多泐，不錄)

《瑞像頌》殘存的碑文中，沒有直接的紀年文字。今在實地考察時，發現該碑相同位置的南壁近門處，有人名題刻三十三行，分上下兩層排列，作碑形，《金石苑》著錄作《瑞像頌》碑側。所刻人名皆屬利州刺史轄下地方及軍事長官，其中見利州領縣七，為益昌、綿谷、葭萌、嘉川、岐坪、義清、三泉【註六】。按兩唐書記載，唐時郡縣曾有過幾次變動。「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六二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新唐書·地理誌》）。山南西道所轄郡縣在併省過程中曾有過兩次較大的變動，一在天寶元年（七四二年），一在乾元元年（七五八年）。利州都督府在武德元年（六一八年）曾領綿谷、葭萌、益昌、義清、岐坪、嘉川、景谷七縣，隨後領縣屢有去就，到天寶元年時，利州領縣六：綿谷、胤山、嘉川、葭萌、益昌、景谷，乾元時不再改動。從武德年「權置州郡」到天寶元年州郡劃定時的利州領縣看，與碑刻利州轄縣有出入，天寶元年的六縣中，已無碑文所記的岐坪、義清、三泉，以碑文參校地誌所記之六縣，又新出胤山、景谷二縣【註七】。二者所記縣名的變動似應在武德初年至天寶元年之間的併省過程中另有割屬，其中，岐坪縣為利州領縣是在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年）前，開元二十三年後，岐坪割屬閬州閬中郡。寶歷元年（八二五年）省入奉國、蒼溪【註八】。岐坪縣的割屬大致界定了碑頌所刻至遲不晚於開元二十三年。

又，《瑞像頌》第五行見存「天后聖帝」數字，按兩唐書，「天后聖帝」為武則天追封號。睿宗延和元年「六月乙卯，追號大聖天后為天后聖帝」。這年八月壬寅，睿宗又追號「天后聖帝為聖后」，在後代記事中，一般都以聖后稱之，知「天后聖帝」號只在睿宗延和元年啓用過兩個月。碑文記事用「天后聖帝」號，一則說明廣元與武則天的關係【註九】，一則提供

了撰刻碑文的確切時間。

碑文鐫刻在睿宗延和年間的依據，尙可由碑頌記述畢公一系歷任職官得到證實，現條列如次：

1. 碑題下撰人「姪前鄉貢進士彥（下殘）」（第一行）與文中稱「季父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利州（下殘）」（第八行），知畢公與撰碑人彥某爲叔侄關係。

2. 碑文第八行下「源受魏迄梁之大業」句至「郡太守，度支尚書、兗州刺史」一段文字，乃述畢公遠祖由魏迄梁，克濟厥美，傳牧本（兗）州，五葉相襲，不隕其名的榮耀，其族似與兗州畢氏有關。查《魏書》、《北史》有兗州刺史畢衆敬傳，傳中記畢氏一門子孫當朝，世代榮貴。自畢衆敬以下，歷任或追贈兗州刺史者有畢元賓、畢聞慰、畢祖朽、畢祖旋、畢祖彥、畢義和、畢義雲等四代，其族中有一支傳至《元和姓纂》所稱的太原畢氏。陸增祥、岑仲勉考證利州畢公皆依《姓纂》所記「太原畢」世次，《元和姓纂》卷十「太原畢」條：

狀稱畢諶之後，唐滁州刺史畢誠生操，操生正表、正則、正義。正表生重華，綿州刺史，生彥雄。正義，大理正。

畢諶卽發跡於兗州東平，後代號作「東平畢」【註一】，傳四代至畢衆敬。《姓纂》與正史相合，所謂「狀稱畢諶之後」確有其事，利州畢公與東平畢衆敬實爲一脈，都是後漢別駕畢諶之後。碑文所存「郡太守、度支尚書、兗州刺史」一節，應爲畢公會祖的上輩任職情形，時間約當隋代。【註二】

3. 畢公會祖（第十行）以下文字殘缺，名氏供職情形不明。

4. 第十一行「皇朝尚舍奉御蜀號二王府長史，台、鄂、滁三州刺史……」爲畢公「大父」生平行實。查兩唐書，李唐世系中封王蜀、號二地者惟唐太祖第十六子號王鳳，唐太宗第五子蜀王愔，二王受封均在貞觀十年（六三六年）。由此可知，畢公祖父乃唐太宗時人。按《台州府志》卷九，職官表一，貞觀八年至十年出任台州刺史者爲《姓纂》中畢諶之子畢操，知畢操任台州刺史在任蜀、號二王府長史之前。畢操任鄂、滁二州刺史，雖不見於文獻記載，但據以上情形推之，碑文所記似不謬。利州畢公祖父已明，曾祖以下文字雖殘，然《姓纂》中畢諶爲其曾祖當明瞭。【註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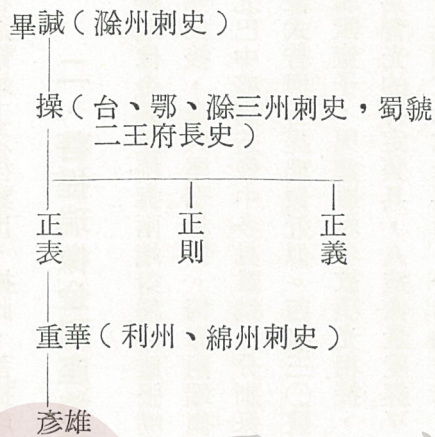
5. 自十二行以后所存文字爲利州畢公生平行實。初爲同倉參軍，次拜滁州錄事參軍，次除博州錄事參軍遷鄭州司兵參軍

，制授秦州都督（下殘，疑都督府屬官）乃至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利州刺史。按碑文排次，畢公應爲△元和姓纂▽中「畢重華」。△姓纂▽記「畢重華，綿州刺史」是爲終職，他刺利州當在綿州之前。根據碑文撰寫時間，重華任利州刺史已盡睿宗朝，任綿州刺史的時間似應在開元初【註二三】，此碑可補校文獻所厥。

6. △姓纂▽記畢重華之子彥雄，與撰碑人「彥□」同屬彥字輩。按△平津讀碑記▽五、△全唐文▽卷三百六，立於開元十三年六月的△大唐龍興大德香積寺主淨業法師靈塔銘▽，其撰人爲畢彥雄，此彥雄卽△姓纂▽中重華之子彥雄【註二四】，他撰△塔銘▽的時間距從兄弟「彥□」撰△瑞像頌▽僅十餘年。彥雄既活動於玄宗朝，其父畢重華任利州刺史在睿宗朝應可信。

經以上條理，利州畢公名氏、年代及其世次已經明朗，排世次如下表：

畢公世係略表：



（*△元和姓纂▽太原畢氏，出兗州諸畢，自誠起傳五代。）

畢重華任利州刺史在睿宗朝，△菩提瑞像頌▽碑刻鑄於延和元和（七二一年）上文已經訂正。按石窟造像通例，碑銘題刻一般在造像竣工之後刻出，據此，菩提瑞像窟的開造應在鑄刻碑文之前，即景雲至延和年間（七一〇—七二二年）。

二、菩提瑞像金剛座椅靠圖像

菩提瑞像金剛座椅靠兩端對稱浮雕張嘴翹鼻的異獸，猙獰可怖，口中銜物，食而未咽。異獸頭上停歇一鳥，似雁長尾，回頭引頸向後，喙與尾羽相接。椅靠兩端側下，再刻躍立狀猛獸，類獅有角，背上騎一小人，作童子狀。有這類圖形的龕像，在川北巴中盛唐造像中多見雕鑄，分別保存在南龕、西龕和北龕摩崖中，圖像雕刻的位置均在跏趺坐佛金剛座椅靠的兩側，主尊像式皆與菩提瑞像近似。西龕三〇號龕像主尊戴冠，臂釧，袒右肩，跏趺坐，手作降魔印，金剛座椅靠兩側刻出異獸、鳥和騎獸童子，與鏤雕忍冬紋項光相接，外輪廓成舟形，人獸圖樣與佛像身光在此作了完美地結合。這類雕刻異獸的椅靠圖像作為背光的特定裝具，△造像量度經▽稱作「六拏具」：

背光制有云六拏具者，一曰伽噌拏，華云大鵬，乃慈悲之相也。二曰布囉拏，華云鯨魚，保護之相也。三曰那囉拏，華云龍子，救度之相也。四曰婆囉拏，華云童男，福資之相也。五曰舍囉拏，華云獸王，自在之相也。六曰救囉拏，華云象王，善師之相也。是六件之尾語俱是拏字，故云六拏具，又以合為六度之義。其尺寸色飾，西番書有上中下之分，且漢地舊有其式，故不具錄。

由六拏具描述可知，廣元千佛崖菩提瑞像金剛座椅靠像飾為大鵬（金翅鳥）、鯨魚（摩竭魚）、童男和獸王。巴中南龕第三十七窟、北龕第十二窟主尊椅靠也有類似的浮雕。（圖二）這類造型奇異的動物圖像，原多為印度神話中諸神的乘物，在公元前後的桑奇大塔等印度古代佛教雕刻中已有表現。作為佛像椅靠兩側的裝飾見於五世紀阿旃陀十五窟本尊的靠背，並於九世紀以後還在印度及東南亞一帶沿用，日本學者稱為笈多式背障裝飾。【註一五】

在國內現存的石窟造像中，這類六拏具圖像最早的實例主要見於唐高宗時期的優填王造像中。龍門敬善寺洞北「韓氏龕」北側永徽六年（六五五年）優填王袒右肩倚坐像，後壁線刻頭光和背屏，肩後椅靠兩側飾有摩竭魚、獸王及童子。龍門石

窟現存優填王像總計有四十二處，造像七十尊，【註一六】均為高宗武周時期雕造，背屏椅靠部分多見刻出此類裝具。近年河南鞏縣石窟亦發現一批初唐時期雕造的優填王像，椅靠兩端的圖像與龍門相同。

初唐龍門、鞏縣石窟大量雕造優填王像，驟然間形成高潮，與優填王像傳入東土這一佛教史上的事件有關。佛教典籍中傳說優填王倚坐畫像東傳的時間在漢明帝時，【大方廣佛報恩經】、【增一阿含經】等早期漢譯佛經以及南齊王琰的【冥祥記】、梁慧皎的【高僧傳】都說由使者蔡愔自西域帶入漢地，畫工圖本，置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註一七】。蔡愔將來的優填王像是否確有其事，至今仍為佛教史上的懸案，真正可信的史料是李唐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年）玄奘法師由印度携歸的優填王像。沙門辯機為【大唐西域記】作讚，記玄奘請得如來肉舍利一五〇粒，佛像七軀，經典五二〇夾，總六七五部。携歸的七軀佛像中有「擬僑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註一八】。玄奘撰【大唐西域記】有專條記述僑賞彌國刻檀寫真像事：

「（僑賞彌國）城內故宮有大精舍，高六千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鄢陀衍那王（唐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訛也）之所作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升天宮，為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愿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加羅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雕刻旃檀。【註一九】」

玄奘遊歷僑賞彌國，所見鄢陀衍那王刻檀佛像，即是舊時所稱的優填王像，正確的說法應是優填王造釋迦像，或如【冥祥記】和【高僧傳】稱作的「優填王畫釋迦倚像」。玄奘携歸的優填王像後置弘福寺，是為唐代優填王造像的祖本。

優填王倚坐像椅靠六竿具裝飾，後漸次用作彌勒佛和毗盧佛的座式。毘盧靠背實例已見前述，彌勒靠背，龍門存有咸亨四年（六七三年）的惠簡洞，垂拱年間（六八五——六八八年）的龍華寺，聖歷（六九八——七〇〇年）前的擂鼓臺中洞等。現藏日本東京博物館，原屬西安寶慶寺舊藏的有蕭元春（長安三年）、姚元景（長安四年）、楊思勗（開元十二年）等雕造的倚佛三尊像，佛座兩側即見有同樣圖像的雕出（圖三）。四川通江魯班石第二、三號窟彌勒本尊背靠六竿具圖像雕刻得異常清晰。

【造像量度經】所謂「漢地舊有其式」的六竿具圖樣是密教造像特有的裝具，施用於倚坐彌勒佛及毗盧佛像背靠上，一

方面說明初唐兩京及四川地區佛教具有顯密雙修的特點，一方面則提供了這類造像樣式由印度傳入的大致情形。玄奘由印度寶來的優填王像實際上成爲中國六拏具圖像依憑的原始圖樣。

三、菩提瑞像與摩訶菩提樹像

菩提瑞像金剛座椅靠「六拏具」圖像基本保持了印度原本的面貌，傳其圖樣當隨整體鋪像一併流入，情形與優填王像的雕造近似。因此，金剛座椅側圖像提供了菩提瑞像來源的線索，軌範儀則仍出印度。

初唐繼玄奘法師之後，對傳印度佛教像軌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有王玄策和求法僧義淨。王玄策出爲唐朝使者，曾先後四次赴印度【註10】。《法苑珠林》卷二九引王玄策《行傳》，錄其使印度時，曾在釋迦成佛地摩伽陀（Magadha，玄奘《西域記》作「摩揭陀」）國摩訶菩提寺求得彌勒菩薩塑金剛座釋迦成道像，又稱摩訶菩提樹像一鋪，「像身東西（面）坐，身高一丈一尺五寸，肩闊六尺二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剛座高四尺三寸，闊一丈二尺五寸」。觀此像尺度合結跏趺坐像的比例。王玄策記錄的這尊金剛座像，玄奘遊摩揭陀國時也見過。《大唐西域記》卷八有專篇記述，所錄傳說與王玄策《行傳》大體相同。金剛座像原造之時，慈氏菩薩（彌勒）化形婆羅門，自願請造「如來妙相」，約定以六月爲限，六月期滿，方可開觀。

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尙餘四日，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跏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眞，惟右乳上塗瑩未周。……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燒，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爲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做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廁衆寶，珠纓寶冠，奇珍交飾。【註11】

《西域記》這段文字已將菩提樹像作了詳細地說明，像軌為頭戴寶冠，項飾瓔珞，袒右肩跏趺坐於金剛寶座，手結降魔印的釋迦牟尼降魔成道像。日本考古學家大谷光瑞曾在印度 Jamal-garhi 搜集到一鋪釋迦牟尼成道像，【註二】結跏趺坐，雙手殘損，原像似作降魔印，釋迦像金剛座側分別刻有二脇侍立像，釋迦頭頂上方浮雕菩提樹，形似華蓋，菩提樹側各刻散華天（圖四），可視作與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像軌則相近的造像。玄奘當時在菩提伽耶見過金剛座尊像，謂「像今尚在，神功不虧」，但却未將圖樣帶回中土。【註三】王玄策一行到摩伽陀國時，見此像安置在摩訶菩提寺內，隨行的塑工畫匠宋法智圖貌形象，携歸長安。《法苑珠林》記其事較詳：

「其像自彌勒造成以來，一切道俗規模圖寫，聖變難定，未有寫得。王使至彼，請諸僧衆及此諸使人，至誠殷請，累日行道懺悔，兼申來意，方得圖畫，髣髴周盡。直爲此像出其經本，向有十卷，將傳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窮聖容，圖寫聖顏，來到京都，道俗競模。」【註四】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記麟德元年（六六四年）玄奘法師臨終前，「又命塑工宋法智於嘉壽殿堅菩提像骨」。

【註五】這是至今所見菩提樹像傳到中土後「道俗競模」最早的記載，而且由宋法智親手模塑。麟德二年（六六五年），高宗幸洛，東京洛陽大敬愛寺塑菩提樹像，則由王玄策親臨指揮。此爲皇家寺院造菩提樹像之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說：「敬愛寺佛殿內菩提樹下彌勒菩薩塑像，麟德二年自內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像爲樣。（原注）巧兒張壽，宋朝塑，王玄策指揮，李安貼金。」【註六】張彥遠記載敬愛寺彌勒菩薩塑像即指《大唐西域記》和《法苑珠林》所說的彌勒菩薩塑釋迦牟尼降魔成道像。當洛陽敬愛寺塑像的同一年，王玄策又在龍門石窟開造菩提樹像。一九七四年，龍門賓陽南洞西壁北側新發現王玄策造像題記一則：

「王玄策□□□□□□□□□□下及法界衆生敬造彌勒像一鋪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註二七】

王玄策題刻的造像現已不存，原像應與洛陽敬愛寺塑像相同。

摩伽陀國菩提樹像自麟德年間宋法智、王玄策在兩京地區造出後，令道俗矚目，道世《法苑珠林》所說「道俗競模」的盛況，是他耳聞目睹的事實。現可見與菩提樹像圖本相似的佛像遺跡，約爲高宗至武周時期的坐佛三尊或三尊七佛的造像樣

式。《神州國光集》中見存有初唐時期的泥壓三尊佛像磚雕拓片三種：

(一)蘇常侍作三尊及七佛磚像，磚背造像銘：「印度佛像大唐蘇常侍等共作」。

(二)善業作坐佛三尊像，磚背造像銘：「大唐善業泥壓得真如妙色身。」（圖五）

(三)善業作坐佛三尊及七佛像，背銘同上（圖六）。

羅振玉在《神州國光集》十一中記善業泥壓像出自西安慈恩寺雁塔中。【註二】屬於唐永徽年後的遺物，善業泥壓三尊像實物另有兩件流入日本，現藏日本東京美術學校。這些泥壓磚像的中心位置雕刻佛祖右肩跏趺坐姿，右手前伸，與座相觸，左手仰掌置於臍下，兩側各刻脇侍菩薩一身，一手上舉托寶，一手下垂持瓶，三尊像項光上對稱刻出菩提雙樹，佛座前刻香爐及蹲獅，佛像樣式與摩訶菩提樹金剛座像基本相合，亦接近印度 Jamal-garhi 釋迦牟尼成道像。有明確紀年的坐佛三尊像是波羅寺僧弁端等造的金銅像，像側題記「永隆三年（即永淳元年（六八二年））」波羅寺僧弁端及侍僧佰一員敬造金銅像」。這鋪像除雕出金剛座上結跏趺坐，作降魔印的釋迦像、脇侍菩薩及金剛座前香爐獅子外，佛像背後又刻出雙塔，佛光上刻兩枝菩提樹葉，這鋪像尚保存有較濃厚的印度雕刻風格，可能更接近摩訶菩提樹原像。

坐佛三尊或三尊七佛是高宗至武周時期頗為流行的造像題材，原藏西安寶慶寺，後流入日本的一批武則天長安年間（七一〇——七〇四）的造像碑，多為三尊龕像，其中與摩訶菩提樹像及上述三尊坐像造型相同的造像碑有四件，代表了初唐菩提樹像的雕造水平。寶慶寺武則天時期的三尊像一度曾作為定型的造像碑圖樣在開元年間繼續流傳翻刻，唐朝名宦楊思勗開元十二年（七二四年）新裝佛堂，刻造像碑一通，三尊龕像即是取法寶慶寺圖樣。石窟造三尊龕像有相對準確年代依據的作品是廣元千佛崖蓮花洞北壁造像，據補刻在正壁的王行淹「大周萬歲通天□年」的造像題記，知蓮花洞造像年代至遲在武則天萬歲通天（六九六）以前。蓮花洞北壁三尊龕像主尊偏袒右肩，結跏趺坐於金剛座上，臂釧，項飾七寶瓔珞，頭螺髮間嵌有一枚橢圓形珠飾，手作降魔印，脇侍菩薩原為兩身，現僅存右邊一尊（圖七）。這鋪像可視作這一時期三尊像的典範。

武則天時期金剛座三尊像的雕造，除有高宗朝王文策、宋法智取回圖樣的影響因素外，更直接的原因似與證聖元年（六九五）義淨西天求法歸唐有關。《宋高僧傳》卷一記義淨「天后證聖元年乙未仲夏還至河洛，得梵本經律論近四佰部，合

五十萬頌，金剛座眞容一鋪，舍利三佰粒，天后親迎於上東門外，諸寺緇伍具幡蓋歌樂前導，敕於佛授記寺安置焉。」【註二九】義淨曾自述自己在印度的經歷：「先到那爛陀，敬根本塔，次上耆闍崛，見疊衣處，後往大覺寺（摩訶菩提寺義譯名），禮眞容像。」【註三〇】可知義淨帶回的金剛座眞容鋪像與宋法智圖本同是一個，即摩訶菩提樹下釋迦降魔成道像，其原始圖樣似爲兩京地區流傳的坐佛三尊形式。

京洛二地自高宗麟德元年至開元初年圖貌的菩提樹像遺跡提供了廣元菩提瑞像的圖像來源，比較兩京三尊像和菩提瑞像窟中心壇鋪像，主尊、脇侍二菩薩以及金剛座、菩提樹、壇前胡跪人物等均相同，不同之處，惟多出二弟子和二力士。壇上主尊跏趺坐於金剛寶座，手作降魔印，偏袒右肩，珠璣寶冠皆合玄奘記述的摩訶菩提樹像儀範。由此推知，廣元菩提瑞像也是依王玄策、義淨帶回的菩提樹像圖本雕造的，這一推測可由菩提瑞像殘存碑文得以證實。

據《菩提瑞像頌》碑文第七、八兩行：「初者天竺不（衆）生思睹像法，能殫衆巧所擬，罕成上界，通士感念（下殘）泥不滿，備珍飾而相好周圍，靈哉眞顏，今卽遺制」句，直敘菩提瑞像源自印度，所指卽王玄策出使摩伽陀國，圖模摩訶菩提寺「金剛座上尊像」時所說的傳聞，與前引玄奘法師《大唐西域記》彌勒化現婆羅門用香泥塑像，「乳上未周，填廁衆寶」的記載完全相合。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爲釋迦牟尼成等正覺道場，國內佛教造像遺跡頗豐，王玄策《行傳》稱「西國瑞像無窮」，摩訶菩提樹像僅爲其中之一。玄奘《西域記》用兩卷篇幅僅記其所見大要，在他取回的七尊佛像中，就有兩尊得自摩伽陀國。【註三一】《菩提瑞像頌》碑文事有專指，利州刺史畢重華造金剛座眞容，作菩提瑞像頌文，實際上是以王玄策、義淨攜歸的菩提樹像和天竺傳聞爲依據，卽碑頌所說的「靈哉眞顏，今卽遺制」。

四、菩提瑞像與毗盧遮那

雕造於唐睿宗朝的菩提瑞像，是直接取法於中印度摩伽陀國降魔成道的金剛座眞容。但到王蜀乾德六年（九二四年）裝修該窟時，越國夫人卻將菩提瑞像題作毗盧遮那佛，「設齋表贊永充供養」。【註三二】越國夫人裝修記間接地告訴我們，晚唐五代時的毗盧遮那佛像樣式與初唐傳自中印度的珠纓寶冠，結降魔印的菩提樹像相同或相近，而開元天寶之際雕造的巴中

南龕一〇三窟毘盧遮那大像與菩提瑞像造型特徵上的一致，更將這一演變提早到開天盛世，二像名稱的更替，實際關係着密教尊像在中土傳寫圖貌的發展過程。

按目前學術界共同認可的說法，儀軌規範的毘盧遮那像的繪造出現在西僧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大寶梵本，來達長安」，相繼譯出胎藏、金剛兩界密教本經《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世稱《大日經》）和《金剛頂經》（即《金剛頂瑜珈中略出念誦法》）【註三三】之後，初唐時兩京地區流行的密教圖像為隋唐之際傳入的印土雜密。四川巴中石窟見存的毗盧佛像，均屬開元三大士弘密時期繪造，其圖樣與後世所傳經軌圖本中戴冠、臂釧，趺坐蓮台，手結智拳印的毗盧佛像樣式差距較明顯。將現存唐代風格的毘盧遮那像造型特徵作一比較，我們發現其圖像樣式多屬上述高宗武周時期流傳的坐佛三尊形式，這就不得不使我們重新注意初唐期的密像流傳繪造的情況。

早在玄奘西越流沙，取經天竺之前，漸趨發達的印度密教隨着西僧的東來，密法雜咒已有部分流傳【註三四】。降及高宗、武周時期，翻密之風轉盛，密像壇咒公行於兩京寺院。兩京地區翻經建壇對後世影響最大者屬永徽二年的慧日院陀羅尼普集會壇，當時施行只限於寺院小範圍內，長安僧俗大都不解此法，但到永徽五年（六五四年）阿地瞿多從《金剛大道場經》【註三五】中輯出釋迦佛頂壇供像法，譯成十二卷本《陀羅尼集經》，並奏請流通，此法遂傳民間，天下普聞。這一過程見於《陀羅尼集經》譯序中：

「有高德沙門厥號阿地瞿多（唐言無極高也），是中天竺人也……永徽二年正月屆於長安，敕住慈門寺……然則經律論業傳者非一，唯此法門未與斯土，所以丁寧三請，方許壇法，三月上旬赴慧日寺浮圖院內，法師自作普集會壇，大乘琮等一十六人，爰及英公、鄂公等一十二人，助成壇供。」

「便請法師於慧日寺，宣譯梵本且翻要抄一十二卷……從四年三月十四日起首，至永徽五年歲次甲寅四月十五日畢，……今此略抄，擬載詳定，奉請流通天下聞焉。」【註三六】

《陀羅尼集經》主要內容有二，一為建壇法，一為法像儀軌。在此法門初傳唐土之時，這兩方面的內容自然顯得特別實用和重要。無極高依經建壇，壇上設佛頂像，其儀軌制度，《陀羅尼集經》卷一記載頗為詳細：

「時佛世尊爲諸會衆說佛頂法……若依行者，於淨室中安置佛頂像，其作像法，於七寶華上結跏趺坐，其華座底戴二獅子，其二獅子坐蓮華上，其佛右手者，申臂仰掌當右腳膝上，指頭垂下到於華上。其左手者，屈臂仰掌向臍下橫著，其佛左右手臂上，各著三個七寶瓔珞，其佛頭中亦著七寶瓔珞，其佛頭頂上作七寶天冠，其佛身形作真金色，被赤袈裟。其佛右邊作觀自在菩薩（一本云十一面觀世音像）。右手屈臂向上把白拂，左手申臂向下把澡罐，其罐口中置於蓮華，其華端直，至菩薩頂，臨於額前。其佛左邊作金剛藏菩薩像，像右手屈臂向肩上，手執白拂，左手掌中立金剛杵，其一端者從臂上向外立著。咒師於佛前，在（左）右邊胡跪，手執香爐，其佛光上作首陀會天，散花形。作此像已，於清淨處，好料理地莊嚴道場於中安置此已。」【註三七】

按佛頂像法的解釋，佛頂壇像主要爲一佛二菩薩的三尊像形式，佛頂尊結跏趺坐於七寶蓮臺，右手置於膝上，左手橫向臍下，類似造像中的降魔印，佛頭着七寶冠，臂釧，項飾瓔珞。兩側脇侍，右爲觀自在菩薩，持物爲淨瓶和白拂，左爲金剛藏，持物爲金剛杵和白拂。除此三尊像外，另有佛座下的二獅子，佛前胡跪執香爐的二咒師，以及佛光上方的散花天。觀此儀軌記載的佛頂壇像與唐高宗武則天時期流行的三尊造像極相切近。西安寶慶寺舊藏的四鋪金剛座三尊像。中間主尊袒右結跏趺坐，右手臂釧前伸，置於膝上，左手仰掌屈臂橫向臍前，頭著寶冠或在螺髮間飾寶華，兩側脇侍菩薩，一爲持白拂澡罐的觀世音菩薩，一爲手托金剛杵撫飄帶的金剛藏菩薩。金剛座間刻二胡跪狀小人或獅子，其間置香爐。像後雙樹交蔭，形同華蓋，樹兩側各刻一飛天（圖三）。寶慶寺三尊像取法摩伽陀國摩訶菩提樹像，卻也基本合於佛頂像法，不同之處僅在佛座的形制一爲蓮座，一爲金剛座。至於佛頂像法中未見記述的菩提雙樹，△陀羅尼集經▽卷二「畫一切佛頂像法」有專軌敘說：

其像背後畫雙樹形，樹上畫作嚩嚩陀迦布瑟波形（唐云陵霄華也）間錫樹葉……【註三八】

至此佛頂像法軌則與三尊像樣式之間的異同已很顯明，廣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中心壇像與寶慶寺同出一源，鋪像組合與佛頂像軌間的對應關係亦是不言之明了。

問題在於佛頂像軌的撰述依據是否也與摩伽陀國摩訶菩提樹像有關？爲解答這個問題不妨看看初唐時有關佛頂經咒像法

的翻譯情況。

據《開元釋教錄》卷八、《陀羅尼集經》譯序記載，阿地瞿多為中印度高德沙門，於永徽三年壬子正月廣將梵本來屆長安，在慧日寺浮圖院建陀羅尼普集會壇，隨後譯出的《陀羅尼集經》是從梵本《金剛大道場經》中輯出的像法和壇法。阿地瞿多在長安建壇翻密的這段史實，說明這位西僧日常的修持和擅長，他在長安，受到僧俗乃至宮廷的重視，也正是因為他精通壇法禁咒之術。

無極高併不是最早傳譯佛頂禁咒的中印度僧人，在他之前，有摩伽陀國三藏禪師闍那耶舍。《歷代三寶記》卷十一說：「武帝世，摩伽陀國三藏禪師闍那耶舍，周言藏稱，其二弟子耶舍崛多，闍那崛多等，為大冢宰晉蕩公宇文護，於長安舊城四天王寺譯」「佛頂咒經併功能一卷，保定四年（五六四年）譯，學士鮑永筆受」。闍那耶舍在長安譯出的《佛頂咒經併功能》是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傳入之始。阿地瞿多永徽五年再譯《陀羅尼集經》「佛頂像法」，更使佛頂經像得以完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在阿地瞿多之後，又有中印度沙門地婆訶羅於垂拱年間（六八五——六七六年）校譯杜行凱譯本《佛頂最勝陀羅尼經》傳世。【註三九】

以上幾例出自中印度僧人譯本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致說明中印度僧人對佛頂經像有特殊的持誦能力。

摩伽陀國為中印度諸國中的佛教中心，佛教聖迹相鄰，玄奘遊歷其國，見有「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大唐西域記》卷八）。大凡中土求法僧人遊履印度，摩伽陀國為必到之地。玄奘、義淨等高僧研習大乘經律的那爛陀寺，即是印度諸國仰側之所，在他們携歸的經籍像軌中，有相當數量得自摩伽陀國。【註四〇】王玄策四使印度，目的地均在摩伽陀國，出使活動中，常與該國佛事相關。【註四一】有唐一代求法高僧遊踪達於中天竺者人數頗衆，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所記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由此可見，摩伽陀國與中國佛教經像的傳播，關係密切程度非印度它國可比。北周時摩伽陀國禪師闍那耶舍，唐高宗時中印度沙門阿地瞿多，武則天時中印度沙門地婆訶羅相繼東來，翻譯佛頂經咒，決非偶然，世傳有關佛頂的經籍像軌極有可能出自摩伽陀國，依據有二：

其一，據前引《法苑珠林》記王玄策一行規模圖寫摩訶菩提樹像的文字中見有為該像出的經本：

「王使至彼，請諸僧來，及此諸使人，至誠殷請，累日行道懺悔，兼申來意，方得圖畫，髣髴周盡，直爲此像出其經本，向有十卷，將傳此地……。」【註四二】

這節文字包含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在菩提樹像造出之後，有專門記載這尊像的軌則制度，一則可知摩伽陀國是出佛經像軌的地方。這十卷經本當由王玄策隨菩提樹像一併帶回長安。

其二，阿地瞿多宣譯《陀羅尼集經》的底本爲《金剛大道場經》，而摩伽陀國菩提樹像所在的「菩提樹垣」爲釋迦牟尼成等正覺的證聖道所，有金剛座道場之稱。《大唐西域記》卷八「菩提樹垣」條：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部，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動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註四三】

按玄奘記載，此金剛座道場爲地勢險峻之地，即所謂「下極金輪，上侵地際」，「周垣疊磚，崇峻險固」。王玄策游止其處，曾立碑銘贊此聖迹：「鬱乎此山，奇狀增多，上飛香雲，下臨澄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經過，存聖蹟於危峰，寧遺趾於巖阿。」【註四四】釋迦於此降魔成道，塑像靈蹟，神功不虧，是爲印度最勝聖境。此處的金剛座道場和菩提樹像恰好與《金剛大道場經》名及經中記載的「佛頂像法」相對應，這一點亦不能視作偶然巧合。

其三，阿地瞿多翻譯的《陀羅尼集經》，在「佛頂像法」後附「佛頂破魔結界降伏印咒」中解釋此印咒功能說：「釋迦牟尼初成道時，坐菩提樹上，先用此印誦陀羅尼，護身結界降伏諸魔，成等正覺……。」【註四五】釋文與玄奘記述的摩訶菩提樹像傳說相吻合，是知佛頂像的軌則是依菩提樹下降魔成道像而述作。

另外，在廣元千佛崖菩提瑞窟旁的彌勒壇像窟內南壁，存有孟蜀明德四年（九九七年）王重敘補刻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一通【註四六】，值得注意之處在於，彌勒窟與菩提瑞像窟是作爲一組同時雕造的洞窟，造像主可能同是利州刺史畢重華。補刻的陀羅尼幢年代雖稍晚，但據兩窟組合關係判斷，王重敘陀羅尼幢的雕造亦與菩提瑞像有一定的關係。

上述論證如果成立，似可得出如下結論：阿地瞿多輯譯《陀羅尼集經》的底本《金剛大道場經》出自摩伽陀國，《陀羅

尼集經》中的「佛頂像法」依摩訶菩提樹像撰述。這樣，廣元千佛崖菩提瑞像、阿地瞿多宣譯的佛頂像以及摩伽陀國的菩提樹像之間的關係似已明朗，三者同屬一鋪造像。

早期譯出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中結跏趺坐，作降魔印，珠纓寶冠的佛頂像釋迦牟尼，在善無畏，不空等西僧開元中傳譯的佛頂尊勝經軌中已譯作法身佛毗盧遮那，茲舉一則經文，以見一斑。

善無畏譯《佛頂尊勝心破地獄轉業障出三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種悉地真言儀軌》：「諸佛如胡麻，遍虛空界，……其山上有阿字，變成種種色微妙金剛地輪，輪上有三十八肘道場，暗字變成三重摩尼寶殿，即欲色無欲色界也，以七寶莊嚴。其妙宮內十肘壇場，即此十法界。其場中在大覺獅子座，其中在阿字，變成四肘瑟石，即重蔓荼羅也……其上在白大蓮華，其華之上有阿字，變成法身摩訶毗盧遮那如來身。……由此當知，尊勝佛頂者，即是毗盧遮那如來身。」

這則密教經軌文字，再明確不過地闡明了佛頂尊像與毗盧遮那之間的關係，二者原為一身而二名。利州刺史畢重華開窟造像之時，雖有佛頂像法的譯出，但毗盧遮那一名尚未流行，這大概就是廣元千佛崖造出毗盧遮那像仍舊襲用「菩提瑞像」一名的原因之一。毗盧遮那佛號見諸經軌並為道俗稱頌約啓於開元三大士譯經之後，越國夫人裝修菩提瑞像，題「毗盧遮那」佛號於石壁已是毗盧經像廣被東土，傳頌有年之事了。

以上圖像學考察結果表明，密像主尊毗盧遮那尊形起於摩伽陀國摩訶菩提樹釋迦降魔成道像，在中國的繪造是在唐高宗時期。中印度沙門阿地瞿多永徽年間（六五〇——六六五）建壇翻密，已是系統密像經軌傳入之始。而宋法智、王玄策麟德（六六四——六六五）塑像則是開元胎藏、金剛兩界密像主尊的祖型。

註 釋

【註一】：據《金石苑》著錄原碑高六尺五寸，越國夫人裝修題記截斷部分高三尺三寸，畢公原碑文僅保留不足一半。

【註二】：「註三二」越國夫人裝修題記全文：「府主相公宅越國夫人四十二娘奉為大王國夫人重修裝毗盧遮那佛壹龕并諸菩薩及部從音樂等全已裝嚴成就伏愿行住吉祥諸佛衛護設齋表贊訖永為供養乾德六年十月十五日白」。

【註三】：《金石苑》卷一跋尾說：「畢公未書名氏，文多泐」。

【註四】：詳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十一，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頁四九三。

【註五】：文見岑仲勉《金石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頁一三〇——一三一。

【註六】：碑側文字詳見《金石苑》第一冊。陸增祥曾收有碑側拓本，惜未引起注意。

【註七】：胤山即義清，天寶元年改名胤山。三泉縣原屬利州，天寶元年割三泉屬梁州。景谷縣一直屬利州領縣，碑文中不見景谷縣名，原因不明。

【註八】：《新唐書·地理志》「閬州閬中郡岐坪」條。

【註九】：廣元為武則天出生地，皇澤寺今存有武則天石刻像，碑文中特書「天后聖帝」即出於武則天與廣元的這層關係。

【註一〇】：《元和姓纂》卷十設有「東平畢」專條。

【註一一】：岑仲勉《畢利州及其時代》一文對此節官職考證較詳，惟誤作畢公曾祖所任官職，實相差一世。文見《金石論叢》頁二二一。

【註一二】：陸增祥認為碑文中台、鄂、潞三州刺史者為《姓纂》記「潞州刺史」的畢誠，實誤一代。

【註一三】：《綿州志·職官》刺史名中不見畢重華，所記綿州刺史最早者為開元中皇甫恂，畢重華任綿州刺史可能在皇甫恂之前。

【註一四】：參見岑仲勉《金石論叢》頁一三〇。

【註一五】：見曾布川寬《龍門石窟唐代造像的研究》，《東方學報》第六〇期，一九八八年。

【註一六】：李文生《我國石窟中的優填王造像》，《中原文物》，一九八五年第四期，頁一〇二——一〇六。

【註一七】：《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引《冥祥記》：「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一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號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恭敬事之。……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齋優填王畫釋迦倚像，莫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大正藏》五二卷，頁四一三）。

【註一八】：辨機《大唐西域記贊》見章巽校點本《大唐西域記》，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頁三〇九。又見慧立、彥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大正藏》五十卷，頁二五二）。

【註一九】：《大唐西域記》卷五，頁一一一。

【註二〇】：關於王玄策出使印度，中外學者多有考證，主要有兩種意見，一說三次，一說四次，諸說詳見馮承均《王玄策專輯》一文（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中華書局版，頁一〇四）。現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玄照傳」載「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敕旨，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一節，似為玄策第四次出使印度，可作參證的材料有《法苑珠林》記玄策去摩伽陀國寫菩提樹像事，塑工宋法智巧窮聖容，「來到京都，道俗競模」。宋法智為玄策在嘉壽殿堅菩提像是在麟德元年（六六四年），似為「道俗競模」之始，知其圖寫菩提樹像的時間應距麟德元年較近。

又麟德二年（六六五年）高宗幸洛，由王玄策追返的僧人玄照在洛陽由高宗詔見。同時王玄策指揮在洛陽敬愛寺塑菩提樹像，今又在龍門賓陽南洞發現王玄策麟德二年的造像題記，此後京洛菩提樹像才真正為道俗競模。據以上文獻與遺蹟的年代判斷，義淨記玄照之事值得重視，玄策此次「重詣西天」為第四次出使，宋法智圖寫聖容當在這一次使摩伽陀國時。

【註二一】：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八「摩揭陀國（上）」，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頁一九八。

【註二二】：《西域考古圖譜》「印度雕刻(6)」，國華社，大正四年五月印行。

【註二三】：玄奘帶回印土佛像七軀，其中有得自摩揭陀國佛像三軀，但均不是菩提樹像。詳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唐西域記》「辨機贊」。

【註二四】：《法苑珠林》卷二九，《大正藏》第五三卷，頁五〇二。

【註二五】：慧立、彥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中華書局校點本，一九八三年版，頁二二一。

【註二六】：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畫史叢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頁五〇。

【註二七】：李玉昆《龍門石窟新發現王玄策造像題記》，《文物》，一九七六，頁九四。

【註二八】：羅振玉記：「大唐善業泥諸城劉燕庭方伯始得於長安慈恩寺雁塔中，此為鮑子年先生康所藏，在善業泥中最精善者」。

【註二九】：贊寧《宋高僧傳》卷一「義淨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頁一。

【註三〇】：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義淨自述」，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頁一五三——一五四。

【註三一】：玄奘由摩揭陀國取回的兩尊雕像，一件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通光座高三尺三寸，另一件「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華經像金佛像，通光座高三尺五寸」。

【註三二】：《大日經》為胎藏界本經，開元十二年（七二四年）由善無畏并一行譯於洛陽大福先寺。《金剛頂經》為金剛界本經，開元十一年（七二三年）由金剛智譯於長安資聖寺。參見《開元釋教錄》卷九。

【註三四】：詳見《歷代三寶記》卷一二，《大唐內典錄》卷五，《古今譯經圖記》卷四。

【註三五】：據《佛說陀羅尼集經翻譯序》說，陀羅尼集經出自「金剛大道場經、大明咒藏分之少分也」，故以《陀羅尼集經》名之。

【註三六】：「註三七」、「註三八」、「註四五」、「註四七」分見《大正藏》卷十八，頁七八五，頁七八六，頁七八七，頁九一三。

【註三九】：《開元釋教錄》卷九。

【註四〇】：參見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八，卷九。《舊唐書》卷一九八「天竺傳」：「貞觀十年，沙門玄奘至其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

【註四一】：參見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九。

【註四二】：《法苑珠林》卷二九，《大正藏》卷五三，頁五〇二。

【註四三】：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八，頁一八七。

【註四四】：《法苑珠林》卷二九。

【註四六】：王重敍陀羅尼幢刻小字僅一面可辨，幢文如下：「多鉢喇淋提薩婆他揭多地……右弟子王重敍奉為皇帝□主朝野重臣過世貳親四生六類建立此幢永為瞻敬明德四年歲次丙申九月中旬設齋表慶訖」。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廣元千佛崖菩提瑞像考



圖一 廣元千佛崖菩提瑞像



圖二 廣元·巴中石窟摩訶庵摩羅王「大摩羅」形象

（1.巴中石窟37窟摩訶庵摩羅王與金剛力士像壁下 2.廣元千佛崖菩提瑞像 3.廣元千佛崖菩提瑞像 4.巴中石窟12窟摩訶庵摩羅王像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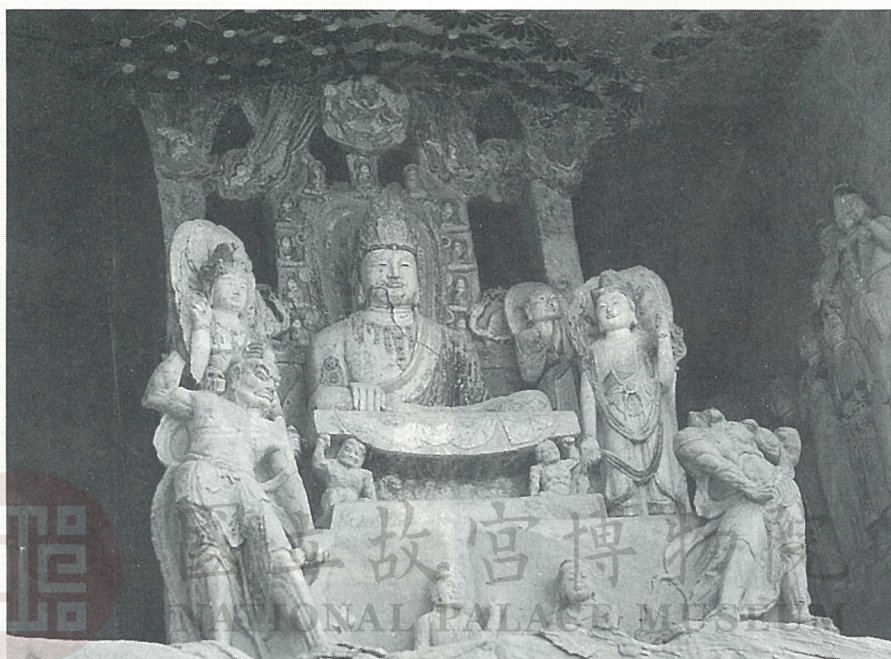
故宮學術季刊 第九卷 第二期

【第四六】：〈...〉
【第四七】：〈...〉
【第四八】：〈...〉
【第四九】：〈...〉
【第五〇】：〈...〉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一 廣元千佛崖菩提瑞像



圖二 廣元、巴中石窟毘盧佛椅靠「六拏具」形象

(1. 巴中南龕37窟毘盧佛右側童子騎獸王 2. 廣元千佛崖菩提瑞像背靠童子騎獸王
3. 同1右側金翅鳥 4. 巴中北龕12窟毘盧佛左側椅靠圖像)



圖三



圖四



圖六



圖七

圖三 西安寶慶寺原藏釋迦三尊石像

圖四 印度 Jamal-garli 釋迦牟尼成道像

圖五 三尊及七佛磚像

圖六 善業泥壓坐佛三尊像

圖七 廣元千佛崖蓮華洞釋迦三尊龕像



圖五